

「文化熱」與「國學熱」

湯一介

「五四」的反傳統重點是幾千年形成的舊傳統，而80年代的反傳統重點則是幾十年來形成的極左新傳統。不加分析地批評「五四」和「文化熱」是有害的。90年代的「國學研究」熱可能有兩種走向，一是把中國傳統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發展的總趨勢中來考察，另一種可能就是傳統文化的研究離開了學術的軌道而意識形態化。

80年代中期在中國大陸發生的「文化熱」，在北京地區首先是由「走向未來叢書」推動的，接着有「中國文化書院」、《文化：中國與世界》雜誌等學術團體的參與。這個「文化熱」到1989年「六四」被打斷了，這樣在中國大陸關於文化問題的討論以及中國如何走向現代的討論又陷入沉寂。但到1992年「國學熱」卻悄然興起，這可以「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和《國學研究》等刊物的出版為標誌。

這兩年來，有些學者寫文章提出要對80年代的「文化熱」進行「反思」。我認為，對80年代的「文化熱」作合乎實際的理性反思無疑是必要的，不過其中有些看法不符合實際。有的學者認為「文化熱」的「反傳統」是激進的、輕率的和不負責任的；有的學者認為「文化熱」有一種「泛文化傾向」。我認為，這些看法或者是由於對80年代文化討論的不了解，或者是出於某種偏見。因此，我作為當時文化問題討論的參與者，不得不作些說明。

為甚麼80年代會發生文化問題的討論？我認為，有兩個原因應受到重視。第一個原因是由於「四個現代化」的提出，使一些學者擔心中國又可能走上只重「科學技術」（主要是技術）的道路。我記得1985年5月曾在深圳召開過一次有北京、上海、武漢、西安、深圳五地學者參加的小型「文化問題討論會」，這次會議還有兩位美國朋友參加。會後，我們寫了一份會議紀要，現抄錄一段，請大家參考：

五四運動以來，現代化的口號提出了半個世紀，而現代化的進程卻一次又一次被打斷，這是甚麼原因？看來，有一個問題沒有很好的解決。現代化

不只限於科學技術層面，更重要的是應該有文化深層的現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以及對我國新舊傳統的歷史反思等等。現代化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提出要實現現代化就說明我們仍然處在「非現代化」的歷史時期。那麼，首先就有一個「現代化」與「傳統」的關係問題，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價值觀念上的衝突，這個問題不能不和傳統文化息息相關。

從上面一段文字看，當時已關注中國社會發展的走向，希望「現代化」不要僅僅限於「科學技術」層面，而應有「文化」的層面相配合。也就是說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有一個「全面的現代化」，不僅科學技術要現代化，而且政治、文化也應現代化。我們希望的是科學技術、經濟、政治、文化能同步從前現代進入現代，並沒有想要「跳過」物質文明，直接涉入體制，而緊接着便落實到文化層面；更沒到希望文化可以醫治「百病」的地步。可是沒有文化的現代化相配合，我們的「現代化」難道能說是一完整意義的現代化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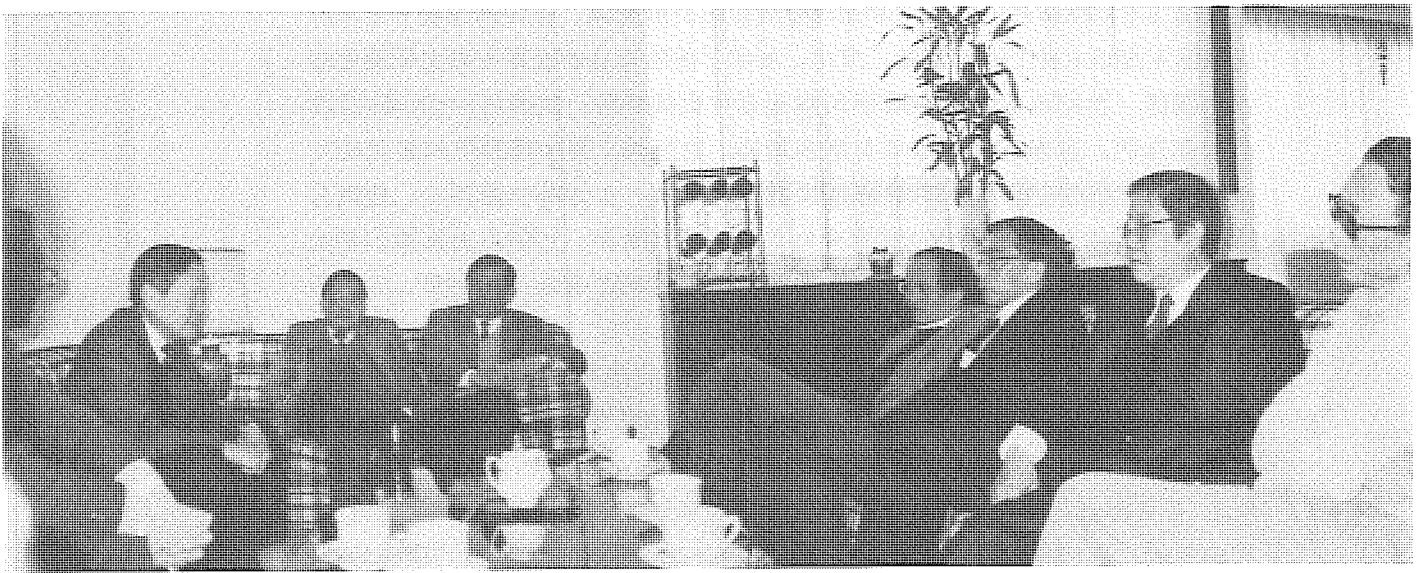
當時，我們提出了「現代」與「傳統」的關係問題，而且特別強調「現代」與「新傳統」的關係問題。我們知道，「五四」運動的「反傳統」的重點可以說是反對幾千年形成的舊傳統；而80年代的「反傳統」的重點，則是幾十年來形成的極左教條主義的新傳統。而且，反對幾十年來形成的極左教條主義新傳統，也正是為了保護幾千年來中國文化中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我們難道會忘記前此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景嗎？那時一方面在瘋狂地破壞着中國文化中有意義、有價值的部分；另一方面對中國文化中的糟粕大加頌揚。因此，我們無可否認這幾十年來形成的極左教條主義新傳統和幾千年的舊傳統之間的聯繫。我們還應該看到，當時參與文化討論的至少有不同的三派（或者更多的不同學派），有的激進些，有的保守些，有的採取了自由主義的態度。這三派雖然路向不同，但卻能比較理智的討論問題，並在批評幾十年來形成的極左教條主義上有着共識。因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推動中國文化發展的合作關係。我認為這應是中國學術界非常可貴的經驗。我們可以《河殤》這部電視劇為例。這部電視劇無疑有許多錯誤，它反映了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片面了解，可是《河殤》作者的意圖是甚麼？我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他們是借批判三千年來批判30年的封閉文化政策。從這點看，它仍不失有其一定的意義。而且從十七、十八世紀以來，我們的國家難道不是一個封閉、守舊的國家嗎？

現在有一些學者不加分析地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批評它的「反傳統」，我認為這是很不公正的。我們試想，如果沒有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那套維護專制統治的舊傳統、舊道德，如「夷夏之防」、「三綱六紀」、「三從四德」、「八股取士」等等猛烈地衝擊一下，我們的社會能前進嗎？當然，五四的「反傳統」是有缺點的，有它的片面性。可是「五四」的精神在今天仍有它正面的積極意義。而且也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了專制、腐朽的東西，才可以使中國文化的真精神顯現出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之所以發生問題，我認為主要

是由於政治的原因，致使中國文化屈從於政治，而沒有能使文化較為合理的發展。

反觀80年代的「文化熱」，在當時的條件下，確實比較難以系統地、深入地討論一些比較具體的問題，如書籍的考訂、文獻的整理、字句的闡釋等等，因為面對的是如何打破多年來教條主義極左思潮獨領風騷的局面，推動中國文化朝着有利促進中國社會的發展並和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接軌。因此，對80年代「文化熱」所取得的成果的否定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

90年代在中國大陸悄然興起的「國學熱」如何走向，還得有一段時間才能看清。就現在情況看，對80年代「文化熱」作理性的反思，在肯定它當時的正面價值和意義的同時，指出其某些不足之處，更加深入地討論和研究一些問題，當然是必要而且有意義的。我們知道，事物的發展總是波浪式的，不會是完全的直線，在對阻礙中國社會走向現代的新舊傳統作過一段較為激烈的批評之後，特別是在對獨斷的教條主義有力的衝擊之後，學者們才比較有可能更為深入地研究一些問題，才有可能對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作比較細緻的梳理。但是，即使這樣，我認為中國的學者也不能不關注現實中國文化的走向和如何與世界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接軌的問題，同時仍然不能忽視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極左教條主義的影響。照我看，「國學研究」可能有兩種不同的走向，一是真正把中國傳統文化放在整個世界文化發展的總趨勢中來考察，使中國文化的真精神和現時代的時代要求接軌，這將是中國文化走出困境，得以復興的唯一出路。如果不使我們的傳統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只是抱殘守缺，哪怕是把古人非常有意義的話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我想也很難使中國文化復興，更不可能



我們的編委會經常在中文大學文怡閣召開：五年來，共開過23次編委會。
左起：勞思光(側影)、楊振寧、陳方正、薛天棟、陳其南、鄭樹森、金耀基、劉述先。

使中國文化對現時代作出貢獻，搞不好甚至會陷入「國粹主義」或「狹隘的民族主義」之中。但從歷史的經驗和目前某種發展趨勢看，也有另一種可能，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離開了學術的軌道而意識形態化，從而背離了某些學者熱心「國學」的初衷。目前已有人提出：「不排除有人企圖以『國學』的概念，來達到摒社會主義新文化於中國文化之外的目的」^①。這一論點倒是企圖人為的把社會主義新文化與「國學」（即中國傳統文化）對立起來，並有企圖把學術研究又重新納入意識形態之中的嫌疑，這無疑是違背「百家爭鳴」的方針的。

當然對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而且應是一切學術研究）作學術上的研究應該有一些規範，例如引用別人的研究成果應該說明，引文應有出處，標點要合乎通常規則，論點要有根據等等，這些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有一些所謂「學術規範」卻超出了一般「學術規範」的要求，認為只有像乾嘉學派或者某西方學派那樣才符合學術規範。這裏我無意否定乾嘉學派或任何某一西方學派所取的「規範」模式，而且對乾嘉學派或西方的某一有價值的學派的「規範」我都尊重。但是要用某一家某一派「規範」作普遍的「學術規範」大概是不妥當的。我認為這樣的要求過份了。我們知道，胡適、陳寅恪、熊十力的學術風格很不相同，但是哪一種算「學術規範」呢？我認為，都是各自的規範。強立一種所謂的「規範」是不可能的，只會有害於學術的自由發展。現在有一種說法：「80年代中期『文化熱』時是有思想無學術，現在則是有學術無思想。」我認為，這個看法不僅不合乎實際，而且把「學術」與「思想」割裂開來也是站不住腳的。無論80年代或90年代的文化研究，我認為，許多學者都是努力朝着通過學術文化的研究來為中國文化的復興和走向世界尋找可行之路。在這過程中可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這都是推動中國社會走向現代的問題，它將會在大家的努力下不斷克服。

我認為，我們這些從事學術文化工作的學者，儘管學術觀點不同，學術風格不同，所採用的方法不同，但只要大家有一個復興中國文化，並使中國文化與現時代世界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接軌以及不是浮泛地而是認真地吸收西方的和東方其他民族的文化的願望，且具有一種寬大的胸懷，那麼中國文化將對世界文化作出有價值、有意義的貢獻。

註釋

① 《哲學研究》，1994年6月號。